

# 我的父母亲

## ——戊草 (中)



图2：父母亲银婚纪念时拍的照片，父亲西装领带，母亲穿一件旗袍，她教书时一直都穿旗袍。

就这样母亲终于用她的体温让小妹在逃难中活下来。

父亲因在抗战爆发后屡屡发动学生向华人各界募捐支援抗战，被日寇占领军列入黑名单搜捕，把我们安顿在难民收容所后的第二天一早，就只身逃到“勿加泗”（Bekasi）附近的乡村Pemanukan隐藏。我们逃离芝加冷时，已经真正的家徒四壁，连屋顶也没了，给暴徒拆光了。我们几个孩子只有身上穿的衣服。在难民收容所时，每当出太阳，母亲就让我们男孩把衣服脱下，光身围着一条“沙龙”（sarung）。她快手快脚地奔到井边洗净晾干，再让我们穿上。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母亲在太阳下到井边洗衣和晾衣的情

景，以及她让我们围上沙龙，生怕我们受凉的表情。

有一天，一个印尼妇人手臂上挽着一个包袱到难民收容所找母亲，她并不知道母亲的名字，只说是在“芝加冷”教书的先生，那时男女教师都称先生（Sen sen），后来才称老师。她见到母亲就和母亲抱头痛哭，并将包袱交给母亲。她年轻时就是我们家的女帮工 Si Mawar，母亲待她好比自己的亲人。结婚时，母亲为她准备一切，协助她在家里办婚礼。暴徒抢劫前夕，她听到些风声，赶紧帮母亲理出每人的两套衣服用床单包回她家。当晚，大抢劫果然发生。

事隔两个多月，Si Mawar才终于探听到我

们逃难到了巴城难民收容所，赶紧乘火车奔到吧城，好不容易探询到难民收容所，送回包袱，才使我们有更换的衣服。母亲每给我们讲 Si Mawar 的故事，总是深情说她是我们受难时的恩人。我们一家至今都还想念她。可惜半个多世纪之后，我有机会回到“芝加冷”时，已经再也探听不到她的一丁点儿消息。

不久我们搬出难民所，为了一家人的生存，除了操持家务，母亲不知从哪里领回材料，用缝纫机缝制口袋，日夜少息。只有八岁的我和十岁的哥哥外出找活干，先在网球场做捡球童、小贩，再专卖报纸，烈日下赤脚走遍巴城各角落，直至父亲四年后再找回我们。那四年，母亲真是辛苦极了。

人们说，客家妇女有“四头四尾”的本事：“田头地尾、灶头锅尾、家头教尾、针头线尾”（指客家妇女要能种地、烧饭、理家、教子、做女红等本事）。母亲虽然是侨生，除了没有种过田，却本事很大，她还一生教书，教育众多学子和我们，还会做许多种道地的客家菜和印尼菜、印尼糕点，是

勤劳能干的知识型客家“娘惹”。

日寇投降，母亲又开始在雅加达“洪义顺”公会属下的“自强学校”教书。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改变了整个亚洲的政治格局。影响之下，印尼华人华侨社会也分裂成两派，斗争激烈。两派争夺华校的结果，自强学校归拥护台湾一派掌管，另一派则成立新的“振强学校”。在振强学校的十多年，我们都懂得每天和母亲起早摸黑为上班上学准备一切，从而养成早起和勤俭的习惯，受用终身。她一生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教书育人，桃李无数。她说三、四十年的粉笔生涯，除了产假，她从未告过假，偶然有病，也总带病教课。我们兄弟姐妹也在那十多年里在父母培育下逐渐长大成人。

1952年读高中二年级时，我因生盲肠炎（阑尾炎）被送入雅加达“圣·卡罗洛斯教会医院”动手术，那时全身麻醉动手术是件大事。母亲说，我住院期间，每当探病时间来医院看我时，她都担心得两腿发软，几乎无力从医院大门走到病房！

我们兄弟姐妹先后回国时，母亲总

是亲自跑商店为我们采购各种日用品，登舟之日，和父亲一早起床准备一切，亲自江干送行。当轮船启航豪情满怀时，我从甲板上看到母亲满怀期望和依依难舍的神情，至今难忘！甚至后悔为何临别时没有好好和母亲诉说衷情，为什么没有想到听听母亲的诉说？以致今天还无法知道当时我们一旦离开印尼，就永远不能再回去的现实中，父母亲的心是怎样的？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

在母亲遗下的相本里珍藏一张我们一家到吧城唐人街“班芝兰”（Pancoran）“中山照相馆”拍的全家福。那是在父亲从隐居的乡下找回我们后几年的春节期间去拍的。（图1）

照片的下端还有父亲写下的一首七绝：

亭亭俏影雁行排，岁末年头拍照来；  
留得萱堂春荫在，芝兰玉树一庭栽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和原乡断绝信函来往多年后，父亲闻悉在梅县家乡的老母仍然健在，十分欣喜。故有“留得萱堂春荫在”之句。